为有忆丛生

胡晓军

我上班的所在，是一座老宅。据说老宅有八十年高龄，与人的寿命相齐。只是妊娠期长，从动土到竣工，用了整整三年。天长日久，老宅不免稍显疲旧，但风骨和韵味皆存，意式的屋顶和观景阳台挺秀依然，中式的雕花门廊和楼梯扶手润泽如昔，尤其是一到春初，园中大片的芳草萋萋、郁郁乎盛哉。最醒目的，是两株高硕的广玉兰，据说是宅子竣工时所栽，犹似一对八旬的老姐妹，与后来的冬青、黄杨、红枫、银桂、腊梅以及月季、丁香、蔷薇、紫藤，把老宅的四季安排得有序而又鲜活。爬山虎是几个顽童，从正门前四根罗马圆柱的底座攀起，从细条到连片，直到把整幢宅子都涂成墨绿，才肯罢休。暮色低垂，周遭静谧，我常会打开窗子，走上阳台，此时仿佛能听见老爷车沉闷而有力的嘶嘶声，接着是主人上楼时皮鞋发出的铎铎声。

这样的感觉，第一天上班时就出现了。虽是夏日白天，但走进园中、走入宅内，也都是凉凉的、静静的。我沿着回旋扶梯拾级而上，所有的房门紧闭。我想，也许主人就在其中的一间安坐，西装革履，点起一支雪茄，神定气闲地等着我。当我叩开三楼的一间房门时，幻觉顿消，开门的显然不是主人，而是主任。

从那天起，每日晨昏，我都在三楼我的办公室里读书报、理材料、写稿件。我常会打开窗子，走上阳台，去望那两株老树和园中芳草，清风徐来，清氛漫度，浑浊的胸臆与倦怠的眼神，都会慢慢地回复清亮。

过了一年，有客人来访。老先生年过七旬，西装革履，举止斯文。他先是谦卑地与主任寒暄，随后委婉地表明来意——在老宅里转一转、看一看。这里是他的出生地，并且伴他度过了童年。

主任命我陪这位昔日的小主人参观。从三楼到一楼，从辅楼到花园，边行边看，老先生的脸庞逐渐泛出光晕，他脚步的折返多了起来，口中的话儿也多了起来。

“这是饭厅，一家人三餐都在这里吃的……啊，现在是会议室了。”“厨房在辅楼，有走廊通过来……啊，没有了。”他转过身说，“三楼东面第二间，就是我出生的房间，门关着……啊，不用，不用进去，肯定不是原样了。”

老先生还说，当时的这幢宅子颇不安宁，男女主人没几位，却经常吵架。有大小老婆角力的，有嫡出庶出争锋的，还有主人骂下人、下人斗下人的……现在作办公楼，凉凉的、静静的，只有我皮鞋发出的笃笃声。

老先生走得累了，在花园的石凳坐下，点起一支雪茄，安详满足地看着我。他上次来时，是十几年前。记忆仿佛园中的芳草丛生，驱使他的双腿，来到这座老宅，来寻自己孩提，那清淡的愁绪与温柔的欣情，交替交织，像是得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病，医好了，复发；再医好了，再复发……下次来时，不知是否还要十几年。

望着老先生的背影，我想老宅若是有灵，一定会有相似的感慨。那个小顽童曾在香软如茵的草坪上狂奔，曾顺着光洁如镜的扶手滑下，说不定还曾敲碎过美丽如画的瓷砖、割开过细腻如肤的镶板……我的确发现底层大厅，好几块瓷砖有老旧的裂纹；二楼走廊，好几块镶板有很长的刀痕。不过我相信老宅有灵，定会像慈母一般安然和欣然地原谅他的。因为他拖着高龄来了，来看望她来了。

过了几年，接到市政开建高架桥的通知。老宅的楼房虽被保留，但花园不能幸免。我不知道被割去了花园，对老宅意味着什么，若仍以慈母作比，那就是有人硬生生地夺去了她绣满花草的丝绒长裙。那些冬青、黄杨、红枫、银桂、腊梅，那些月季、丁香、紫藤还有爬山虎……啊，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；听说那两株老姐妹被迁到了附近的公园，不多久便凋敝、枯萎了。园中的萋萋芳草，更是划尽不能还生。我不是秦观，面对绿色变作灰色，清气变作废气，鸟鸣变成电喇叭鸣，是绝高兴不起来的。我更怕那位老先生再来，他的那场妙不可言的病，怕是再难医好了。

过了十几年，老先生仍没有来。他再也没有来。

而我心中，渐渐积起了清淡的愁绪、温柔的慰藉。每天沿着回旋扶梯拾级而上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皮鞋发出的笃笃声。每间房门都是紧闭的，只有三楼的一间除外。我已很少打开窗子，更不走上阳台。但我偶尔会西装革履，泡起一壶茶来，悠闲自得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等着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、越来越近……

再过几十年，我想自己也会像老先生那样，被记忆驱使而来，拖着高龄，来看望这座老宅。记忆好比心中的芳草丛生，在愁绪与欣情的交替交织中，我像是得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病，医好了，复发；再医好了，再复发……

岁月终无语，风华非有情。行年移少老，添病转阴晴。欣处方堪喜，愁时深可惊。问医何不止，为有忆丛生。

春蚓秋蛇

陈茗屋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市青年宫篆刻班上，方去疾老师常带一些印谱的散叶，给我们学员观赏。这些散叶是他胞兄的宣和印社留下的，内容多是吴让之、赵之谦和吴昌硕的佳作，系当年制作《晚清四大家印谱》尚未装订的。方老师不善辞令，简单地做些介绍而已。

有一次，一叠都是吴昌硕的作品。大家七嘴八舌特欣赏那些粗粗的、破破的观感很强烈的晚年作。方老师大不以为然。他慢慢地拣出一叶，即是这方“春蚓秋蛇”（见图）。老师说，这才是吴昌硕的真面目，后来他做得厉害，破得厉害，不如这个时期。

当时，我们学员几乎全是初学者，听不大懂，也不理解，只觉得破破的富“艺术性”。“春蚓秋蛇”好在哪里，丝毫不能领会。但是，出于对老师的崇拜，牢牢记住了这方朱文印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印谱的出版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，出现了松动。上海书画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开始出版古人的印谱和时人的印集。方老师编辑的《吴昌硕印谱》是印了一次又一次的热销书。虽然纸张和印刷差强人意，但二百五十页排得满满的内容令人大开眼界。奇怪的是，老师着重介绍过的“春蚓秋蛇”却不在里面。

我踏上日本以后，购买了许多他们出版的印谱。选得精，印得好，纸张出色，装帧大方，读了大有收益。吴昌硕是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大印家。是不是因为吴公的粗放风格，暗合了他们刻意想遮盖的民族秉性？我不知道。但只要和吴风搭上一点点关系的，包括邓散木，甚至单孝天，他们都会觉得“斯巴拉希”（日语“非常优秀”之意）。

当然，吴昌硕的篆刻是绝对地非常优秀乃至伟大。对他的赞美，此起彼伏，至今未衰，毋庸我置喙。虽然近二十年来，我对吴让之、黄牧甫比较投入，但毫不影响对吴公的景仰。

我在略略系统地研究了吴公各阶段的印作后，了解了他最为辉煌的《削觚庐印存》时代，才慢慢理解了方老师当年的评价。的确，吴公篆刻最精彩的时期，是他的中年，即制作《削觚庐印存》的黄金岁月。那时的印作，蕴藉无火气，含蓄而不张扬，如谦谦君子。当然，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如火如荼的晚年作品，只是心底更佩服他的中年杰作。

印从书出，吴公以石鼓文为基础。他的石鼓文其实根本不像原先的模样。是旧石鼓文的革新版，是再创作。前无古人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旧石鼓文是方形的，吴公把它拉长，使之更富体形美；旧石鼓文是均匀的，吴公将之打散，紧紧松松，体现旋律。更用古藤的线条处理之，浓郁苍茫，开从来所未见。

吴公的早年，学过浙派，学过吴让之、徐三庚、钱叔盖……到了中年，对石鼓文的研究出现突破，腕底龙蛇，奔腾贞珉，创立了自己散淡淳厚的风格。“春蚓秋蛇”可谓代表。

吴让之和钱叔盖，一用冲刀，勇往直前；一用切刀，斑驳成趣。但运刀的角度都比较大，比较坦，浑厚胜人。吴昌硕的运刀法，深受二人的影响。但是陡陡坦坦，变化更多，集大成而立新风。吴公中年的印作，已经娴熟地运用他独创的刀法，确立了自己的面目。

除了书法和刀法胜人一筹，吴昌硕又以古封泥的破残注入印作。更由于他在学问上底蕴深厚，识见高人。所以在中年削觚庐时代便已睥睨天下。

“春蚓秋蛇”的“蛇”，古篆作“它”，无“虫”旁。吴昌硕用字十分讲究，一般都用本字，不用俗体。此印款署壬午，时吴公三十九岁。那一年，吴公得友人所赠古缶，始号“缶庐”。据日本人考，此缶是赝鼎。不过，那边的人也常胡说八道，不大好相信的。

我有幸读过多种《削觚庐印存》，不乏稿本，包括王哲言先生珍护的那一本。无不精彩，足可为永恒的典范。

据吴公友人的日记，公在中年以后，为追求浑厚苍茫感，一印刻成便在自己的布鞋底上着力搓磨，制造效果。艺术和做人略有不同，允许不择手段。不过，说句笑话，当你摩挲将军洞、大红袍的佳印，也许是重金求来的，一想到是鞋底磨过的，也许会泛起丝丝的不悦。

“春蚓秋蛇”是有出典的。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论》里，载李世民对一位书法家萧子云的批评，讥其书法萦绾无状，缺筋少骨，如蚯蚓和蛇爬行之迹。原先是贬义的。后来，常被书家引为谦语，改邪归正，遂可作褒义用。

当年，方老师出示的“春蚓秋蛇”等等的散叶，过了几个月，经粗粗装订，一部四册，沿用前名《晚清四大家印谱》，即吴让之、赵之谦、胡菊邻、吴昌硕一人一册，页次则散乱无序。在古籍书店的柜台里，陈列了好几部，十五元一部。我和同班的吴子建兄各买了一部。五十年弹指一挥间。前几年，养疴无聊，我按原书的序次重新手装，又央孟群兄做了一个函套。抚卷追昔，不亦乐乎。

读印札记

“取滠柱”与“治洪涝”

唐宝民

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讲了这样一件事：

吴越王钱镠在位期间，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，建造了石堤，并在堤外埋置了十九行大木柱，称作“滠柱”。

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近百年，到宋仁宗赵祯当政时期，这十九行“滠柱”依然树立在那里，于是，有人就向杭州的地方官提出了建议，说：“这些‘滠柱’根本起不到拦水的作用，洪水到来时，照样会淹过‘滠柱’冲向石堤，起挡水作用的是石堤，所以，这些‘滠柱’没什么用。用来作‘滠柱’的木头都是上等的木材，如果把它们取出来，可以获得几万立米的木材！”杭州太守一听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便下令将“滠柱”全部挖出来使用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这些树立了近百年的“滠柱”就被抽取一空；看着堆积如山的上等木材，太守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

可是，当第二年汛期到来时，洪水却猛烈地冲向石堤，很快就将石堤冲毁，致使大部分城区被水淹没……人们这才回过味儿来：原来，前人埋置这些“滠柱”的目的，是为了减弱洪水对石堤的冲击，被“滠柱”拦阻之后，洪水的冲击力就大大减少，从而使石堤不至于受到直接的冲击、不至于决堤。

取出“滠柱”，的确获得了大量上等的木材，然而，此后洪水年年决堤，为了治理洪涝灾害，政府耗费了亿万银两；取出的那些“滠柱”所换得的钱，与治理洪涝所花费的钱相比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看来，这个杭州太守数学学得不好，没算明白这个账。

任何时候，都不要贪图小便宜，那样会因小失大、得不偿失。

李白诗

胡传海 书

夜光杯

为官诫

那秋生

明清时代的许多贤明人士，早已看破封建官场的奥秘，其愤懑之语对于那些官瘾者而言，实在是一帖有力的清醒剂，足以当头棒喝。袁宏道《中郎随笔》说：“大抵病因于抑，抑因于官，官不去，病必不痊。”他无意于仕途，曾三辞其官，但酷爱山水自然。袁枚《自嘲》诗曰：“好诗难与官同作，官苦原同受戒僧。”他三十岁即辞官告归，在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乐在其中。

刘鹗的谴责小说《老残游记》更有妙论：“无才的要做官不要紧，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……这样的官愈大，害愈甚。”这是指为官之人道德不修的结果。纪晓岚高居朝廷，却终日战战兢兢，他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宣告：“吾深悔不早罢官。”还有一位自称严我斯的，终于大悟而留下《绝命辞》：“误落官场几十年，今朝重返旧林泉。”

我和华师大

金文男

我和华师大的渊源，始自我的青葱时代——朦胧中的丽娃河，两岸柳丝披拂，河中涟漪微泛，那是少女心目中的美丽公园；还有那庄严肃穆的文史楼，更是那个年代的我向往的神圣殿堂。曾有几次，我跟着亲爱的大姐在丽娃河边徜徉，还在文史楼前的大草坪里，观看过露天电影，记得第一次看《早春二月》，便是我们姐妹，闻着夏季特有的青草馨香，在草坪上看着谢芳微撇的嘴角，以及别样的微笑，进入那个年代已稀有的影片意境。那时的华师大对于我来说，就像蓬莱仙境一样，可爱可敬极了。

可没多久，一场人间浩劫彻底地打破了这番美好——1968年初夏，我那在外语系任助教的大姐，随着文科大学全部下乡的最高指示，被下放到太仓洪泾大队劳动；又由于早孕反应较重，来上海就医检查，因不知化验需要空腹小便而次日再去，仅仅因为在上海多留了一天，回到乡下以后，就受到外语系一些极“左”分子的批判，批判会的调子越升越高，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。原本就正直、刚烈的她，加上女性初孕时的心理、生理特征，使她没有退路地选择了死。

亲爱的大姐，时隔47年之后的今天，我依旧想你、哭你、爱你！

从这以后，我就怕去华师大，也怕听到“华师大”，在我的青春记忆中，丽娃河和文史楼外面，始终笼罩着一层比今天的雾霾还要灰暗混沌的云烟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祖国大地云开日出。1979年初，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并终于有幸在1980年夏再次来到我爱恨交加的华师大，开始为期5年的中文本科学习。这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愿望，也是我下乡返城后迫切想做的头等大事。第一学期开设的《写作》和《现代汉语》两门课程，任课老师祝文品、王光祖、朱川等，都是资历深厚、师德高尚的优秀教师，我陶醉于他们的讲课中，极其认真地学习着，老师们也以能够教授我们首批“文革”后的夜大学生而自豪。

记得那是1980年底某天写作课前五分钟时，祝老师从讲台上一路走下来，一面问着：“谁是金文男？”我那时坐在倒数第二排，因刚从农村返城不久，加之“文革”中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，我一切都还是那样的怯怯，我小声地说：“是我。”祝老师接着说：“你这篇《路》写得很好。”那天习作讲评时，祝老师表扬了我的这篇作文。

祝老师曾经对我们说：自从到夜校部来任教，我就对夜校同学产生一种别样的感情，几乎有点偏心。我关注着他们，这里有黄金啊！

令人欣慰的是，当年祝老师所说的“黄金”，在他们毕业后的30年间，逐渐成为各行业的栋梁，发挥着作用。我也在祝老师及其他夜大老师的鼓励下，在出版事业中尽一份绵薄之力，编校过很多古籍，也出版过一些著作，至今仍笔耕不辍。

行文至末，我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句：华师大，我爱你，感谢你！但愿心底的那抹伤痕永远都不要再被撕开！

十日谈

夜大春秋

那些可敬可亲的老师令人难忘。